

制度、文化与日常确证

——外来移民及其子女的情景性身份认同

韩晓燕 田晓丽

摘要: 从社会认知形成过程以及日常人际互动的角度分析外来移民的自我身份认同,从而探讨制度、文化以及日常体验在人们认知周遭世界的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在中国现有的制度安排与文化传统的背景下,外来移民的身份认同既受到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独有的“籍贯”和“不忘本”文化的影响,在微观层面又与个体日常生活体验密切相关。当认知验证的不同过程、他者的承认(recognition)、日常经验的确证(corroboration)以及过去知识的共鸣,三者之间产生冲突时,人们有选择性地根据当下的情境调整他们的身份认同。“情景性身份认同”(situational identification)这个概念,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制度性约束、文化以及微观互动过程之间的动态关系。

关键词: 身份认同; 文化; 微观社会学; 认知验证; 流动人口; 白领移民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流动人口生存与发展及社会工作介入战略研究”(12BSH075)

作者简介: 韩晓燕,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工作系教授(上海 200241); 田晓丽,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DOI:10.13613/j.cnki.qhdz.002522

一、外来人口的身份认同

现有研究指出,中国的流动人口普遍面临“身份认同危机”,即外来务工人员虽然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并长期在城市工作和居住,但是绝大部分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蔡禾和曹志刚,2009:148—158; Jacka,2006)。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第二代打工者仍然在身份认同上更倾向于自己是“老家的人”甚至是“农民”,并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许传新,2007:58—62; 卢晖临和潘毅,2014:1—24)。这种对生活和工作城市认同缺乏也延续到他们的子女中,农民工子女同样难以融入城市社会,难以完成城市身份认同的转变(郑友富和俞国良,2009:99—102; 熊易寒,2009:2—12)。

已有研究强调中国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受到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文化二元结构的形塑(Tamara Jacka,2006; 韩晓燕,2012:134—139),突显了户口制度以及由此延伸的不平等的政策安排等对身份认同的影响(陈映芳,2005:119—244; 李培林和田丰,2012:1—24)。然而,很少有研究从微观的角度去分析他们身份认同形成的具体过程。为什么这些在城市生活了很多年,甚至在城市出生的人,会对城市没有认同感呢?仅仅是因为户口问题吗?那获得了户口以后,他们会认同自己是“城市人”吗?

西方学术界有关移民身份认同的研究有两个主要理论。一个理论认为,在美国新一代移民都会一代代加强认同美国身份,淡化移民身份。因为孩子在学校、同伴、大众传媒的影响下,会认为美国文化更加优越。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移出地文化只有象征意义,跟日常生活关系很小(Portes和Rumbaut,2001)。这个理论主要适用于欧洲到美国的移民。Gans(1992)则认为,因为第二代移民可能在

社会流动上还不如他们的父母(second-generation decline),从而使得第二代并不一定会对美国的认同超过他们的父辈。Portes 和 Zhou(1993)提出了“反应性民族认同”这个概念(reactive ethnicity),他们认为,当移民在移入社会里受到歧视的时候,因为感受到威胁与排挤,反而会加强对原有种族身份的认同。“泛移民”身份也是常见的移民身份认同策略(Portes 和 Rumbaut,2001),在受到歧视待遇的情况下,第二代移民会认同一个比较广泛的移民身份,而不是具体到其原有输出地的身份。比如中国移民可能认同“亚裔美国人”的身份,而不是具体指向“华裔”这个范畴。

西方有关移民身份认同的理论虽然对认识中国的流动人口身份有很多启发,比如“反应性民族认同”这个概念,可以用来理解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里受到歧视性待遇时对其身份认同的影响。然而,中国的制度环境、文化背景,以及流动人口结构都与美国的移民大不相同。比如,美国的移民认同往往与种族密切相关,不同的种族在体貌上都可能有明显的差异,而中国的城乡人际流动并不涉及种族问题。另外,中国的流动人口面临户籍的限制,同时又存在着重返家乡的可能性,而且在现实中他们的确经常重返家乡,比如回乡过年。这些也是美国的跨国移民研究中不存在的。那么,这些不同如何影响中国移民的身份认同?

近些年来,关于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研究范式开始从制度中心转换成实践中心,更关注微观层面农民工身份意识的构建,跳出户口制度结构性限制的框架,开始关注进城农民日常生活上的改变。如符平(2006:136—158)认为,农民工多年的城市生活已经使他们获得了能够适应一般城市生活和工作的实践性惯习。的确,流动人口进入另外一个城市,获得的不仅仅是工作的机会和更高的收入,同时也经历了与乡村不同的生活体验。这些生活体验如何改变或者影响他们,只有通过他们主体的叙述才能得知。熊易寒(2009:2—12)在研究上海“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时亦指出,农民工子女自身的身份认同不是简单由社会结构所决定,而是在事件驱动下被建构出来的,具有不确定性。例如,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更加表现出“外地人”的身份,而在返乡时,就会突出自己“城里人”的身份。因此,他认为农民工子女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fication)与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

这些从微观角度探讨农民工身份认同建构过程的研究指出了身份认同的主体性和不确定性。这些研究让我们更了解这个现象的同时,也引发对更多问题的思考:第一,身份认同问题上为何存在个体差异性(variation)?也就是说,同样是外来人口,为什么有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认同城里人或者本地人的身份?第二,第一代和第二代外来人口身份认同的区别如何?现有研究大多将此区别归根于第二代在城市里待的时间较长,但是很多第一代人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了20年甚至30年,远超过他们的子女在城市生活的时间,却仍然认为自己是老家人。第三,获得城市户口后,外来移民会认为自己是当地人吗?第四,在什么情境下,或者基于怎样的考虑,外来移民会认同居住的城市?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依据 Andreas Glaeser(2011)提出的认知验证的三个过程理论,具体分析外来移民身份认同的形成以及不同的验证过程产生矛盾的结果时人们的应对方式。经验资料来自对上海市两个不同人群的比较研究,一个群体是外来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他们在上海生活和工作10年以上,迄今为止没有拿到上海户口,子女在上海借读。另外一个群体是上海的白领移民及其子女,他们来自外地,已经拥有了上海户口,子女可以享受上海市所有的教育资源及其他市民福利。

无论是没有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还是有户口的白领移民,其身份认同都呈现很大的流动性和灵活性,在不同的情境下会有不同的身份认同,我们称之为“情景性身份认同”。也就是说,在某些情景下他们会说自己是上海人,至少更像上海人。而另外一些情景下则认同自己是老家人。在不同的情景下,面对不同的互动群体时,人们依赖不同的文化资源来为自己的身份认同提供依据(justify),如“籍贯”和“不忘本”文化以及“素质”和现代性的有关话语。

本研究有助于了解人们身份认同的过程以及哪些因素影响他们融入或者适应城市生活。在理论

层面,我们探讨当认知验证的不同过程得到的结果发生冲突时,人们何如应对,从而进一步揭示文化、结构以及日常微观互动之间的动态关系。

二、资料收集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资料收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资料收集主要集中在上海市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他们都没有本地户口,但是在上海工作和生活了10年以上。访谈对象是上海闵行区一所中学的外来学生及其家长。这所学校是一所普通的公立初中,从预初到初三共有4个年级,每个年级有4个班级,每个班级约30多人。该校上海学生与外地学生的比例大概一半左右。

此阶段一共访谈了38位学生及其家长,男生和女生基本平均,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各异。访谈大多数是在学生家里进行的,所以包括了家庭周围环境的观察,以及对家庭住房大小、家居布置和家庭设施的观察。每个家庭访谈时间约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对孩子,一个小时对家长。在访谈前都让家长签订知情同意书,所有访谈全部录音。

通过第一次阶段的访谈,发现外来人口的身份认同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虽然跟户口等结构性限制密切相关,但是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于是我们决定做第二阶段的资料收集。这个阶段主要访谈了上海的白领移民,同样来自外地,但是他们及其子女已经获得了上海户口,一般是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的外地学生,也就是被称为“白领阶层”的人。现有关于白领移民身份认同的研究多数为定量研究,将身份认同视为融入情况的一个维度(张文宏和雷开春,2008:117—141;崔岩,2012:141—160;张结海,2011:73—80)。这些研究指出白领移民身份认同的多样性,然而因为多为定量研究,很少涉及这个群体的身份认同主体建构及其原因。因此,在资料收集的第二阶段,选择的受访对象大多为一家全国性的软件公司华东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庭成员(配偶和子女)。为了便于跟之前的访谈对象做比较,这一阶段访谈对象的选择标准是:父母一方是非上海地区长大的,子女现在就读初中,父母和子女都有上海户口。

在这一阶段我们访谈了15个家庭,也是父母和子女各访谈一个小时,访谈的问题与第一阶段大致相同,着重问了身份认同的问题,包括在上海的生活体验,回老家的感受,父辈与子辈的区别等。我们尤其关注他们在不同的情境下身份认同的异同以及他们自己所给出的会有这样身份认同的原因。

所有的访谈都结束后,对这两个群体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虽然这两个不同的群体在经济能力、户口身份以及社会地位上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其身份认同却呈现很多的相似性。

三、身份认知的验证过程及其冲突

Andreas Glaeser(2011)提出,个人对周遭世界的理解和认知往往多种多样,只有经过验证(validate)之后,相对稳定下来的认知才能最终影响人们行动。而验证主要来自三个不同的方面:他者(尤其是权威)的认可(recognition afforded by others),日常生活和行动中得到的确证(corroboration in action)以及与过去知识的共鸣(resonance with preexisting understandings)。认知验证的这三个过程都对移民的身份认同有影响。

最有代表性的权威他者是官方机构,比如没有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普遍认为自己是外地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官方机构的承认,也就是没有户口。比如有个没户口的学生说,我觉得我是广东人,因为“不一定是说上海人就可以呆在上海呀”。有些白领移民会说自己是上海人,一个很重要的依据也是有正式的户口,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对第二代移民而言,父母也是很重要的权威,白领移民子女中,有一部分认为自己是上海人,另外

一些则认为自己是老家人,很重要的因素是父母对他们施加的影响。如果从小父母给他们灌输他们是上海人的观念,则他们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是上海人,反之则会认为自己是老家人。

除了权威性的他者,其他在日常互动中遇到的他者也会影响人们的自我身份认同,比如某些外来移民如果坚持认为自己是“上海人”,但是他周围的其他人却并不这样认为,坚持这个身份认同就会非常困难,久而久之就会放弃这样的身份认知,至少在这些人(往往是知根知底的熟人)面前,他们不会坚持“上海人”的身份认同。

日常生活的确证也是很多移民说自己“不是上海人”的重要原因,这在外来务工人员那里表现最为明显。在城市生活,他们明确地感受到自己与“上海人”在日常生活上的差异,这个差异包括经济水平,更包括由户口制度限制带来的种种不同。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没有本地户口,他们无法在上海上学。户口制度以及跟户口相关的教育政策等形塑了外来人口的日常生活空间,从而进一步为他们的身份认同提供了负面的验证。

然而,拥有的本地户口的白领也很少主动认为自己是上海人,那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很少用户籍来定义自己是哪里人,反而更多的是用日常生活习惯来区分不同地区的人。这种作为日常生活体验的地方文化对身份认同有很大影响。比如一个白领受访者说:

我的生活习惯,小时候居住的环境,都跟上海人不一样。比如我并不喜欢吃上海菜,还是喜欢吃西南那边的东西,可见我不是上海人。

饮食是日常生活文化很重要的因素,在中国是不同地区的地方文化的重要象征。很多受访者都提到正是因为对移入地饮食习惯的不认同,使得他们不认同自己是本地人。一位受访的女性白领说:“因为我父母祖辈都是湖北人,自己从小的生活饮食习惯都是湖北那边的。所以我肯定是湖北人。”一些有了本地户口的白领子女也仍然会从饮食习惯上认同自己是家乡人,比如一个父亲是山东人、母亲是上海人的有户口的二代移民学生,土生土长在上海,却说“我觉得自己是山东人,因为我喜欢吃面食。山东人喜欢吃面食。”受访者普遍认为,只有那些既有上海户口,从小在上海生活,而且父母小时候也在那里生活的人才算上海人,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上海人的生活习惯。

作为日常交流和互动的媒介,语言是日常体验的一个重要因素。方言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移民是否学习或者掌握地方方言,会影响到他们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从而进一步影响对当地的认同。没有户口的第二代移民,在上海的时候,他们普遍认同自己是外地人,因为普遍不会说上海话。虽然因为上海的国际化性质和普通话普及程度,上海话在上海使用得并不多,很多人还是会以会不会说上海话来作为是不是本地人的一个标准。很多第二代移民的子女在上海的时候不会说上海话,但是回到家乡后,他们又发现自己只能讲普通话而不会说方言,从而对家乡也无法认同,于是很多人认同“在上海的外地人”这个身份,“在上海的外地人”共同的地方是大家都讲普通话。

认知验证的第三个方面,与过去知识的共鸣,同样会影响到移民的身份认知。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的籍贯文化。籍贯这个概念在访谈中被访谈对象多次提及,是两个群体的移民都对“上海人”的身份认同程度很低的重要原因。如很多有户口的白领说自己是老家人,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我的籍贯在老家,我是在老家长大的”。受访者普遍认为,籍贯跟户籍不一样,籍贯是不能换的,户籍是可以换的。虽然换了户口,但是也不能改变籍贯在老家的事实。比如,一位受访的白领女性说:

我是湖北人,虽然我的房子在上海,工作、户口都在上海,我也还是湖北的,人家土生土长的才是上海人。我最多被称为“新上海人”,但是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上海人。以后我小孩如果生在上海,应该是一代上海人吧。但是也说不定。

籍贯、血脉等词语频繁在受访者的叙述中出现。多名受访者指出,籍贯的概念在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中有很大的影响。虽然很多人可能并不是特别清楚籍贯和户籍的区别,但是籍贯这个概念影响了

他们的身份认同。这种对自己祖辈,或者是老家所在地的坚持,使得异地谋生的人,无论是哪个阶层的,无论有无户口,都不愿意认同新的迁入地。正如这位受访者所说的:

我觉得中国人回答自己是哪里人,讲究的还是血脉。譬如我以后的孩子,我肯定觉得还是湖北人,孩子身上有湖北血统。户籍只是政府行为,中国人讲究认祖归宗。籍贯的原始意思就有血脉的涵义在,祖上是哪里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对于个体的移民而言,认知的这三个验证过程得到的结论却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比如,白领移民因为已经有了户口,“上海人”的身份得到了官方权威的承认,但是却往往并得不到日常生活的佐证,也无法与过去的知识(如籍贯文化)共鸣。对没有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虽然在“他者”尤其是官方权威这个方面,他们肯定不是“上海人”,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在城市里的日常体验与他们老家人大不相同,所以他们对“老家人”的认同也无法得到日常经验的确证。

四、情景性身份认同及其文化依托

认知验证的不同过程得到的结果相互冲突,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单一的、一致性的身份认同并不存在。无论有无户口,外来移民的身份认同都呈现很大的流动性和情景性,我们将之称为“情景性身份认同”。具体表现为,如果问他们觉得自己是哪里人,他们会说自己是老家人,很少有人会说自己上海人。然而当问到“在某某情况下,你认为自己是哪里人”时,他们的答案却呈现很大的多样性。当面对不同的互动他者(the “others” in a social interaction)时,他们的身份认同也会不一样。很多移民身处上海的时候,会强调自己是外地人,但是回到老家,或者去别的地方,又会认同自己是上海人。

与熟人互动: 不忘本

很多受访者说,即使有了上海户口,在朋友或者熟人面前也不会说自己是上海人。如:

就像有些中国人拿了绿卡就说自己是美国人,但是这样的人会被人看不起。中国人其实是看不起忘本的人的。所以很多人即使来了城里很多年,户口也是城里的,一般不会说自己是城里人。都得说自己家乡。所以如果那些在上海生活几年的人说自己是上海人,都是那种对自己不自信的人才会这么说,是自卑的人。不敢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出生地。那些人那样说会被人瞧不起的。

不忘本的文化以及对忘本的人的嘲笑和看不起,使得移民不愿意在熟人面前公开认同上海人身份。另外一位在上海生活工作很多年的白领说:

如果仅仅有了城市身份,或者在大城市住了几年,就认为自己是那个城市的人。会被认为是自卑,没有自信的表现。所以我不那样说。但是我有另一个同事就说自己是新上海人,跟别人解释半天,说自己是江西的,现在家庭生活上海什么的。我们都懒得搭理他。

这位受访者明确指出,如果仅仅因为有了城市户口就认同自己是大城市的人,会被人瞧不起,子女这一代也受到“不忘本”文化的影响。访谈中有很多学生自己提到籍贯问题,说虽然住在上海,但是籍贯在老家。有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说,即使有了上海户口,也不会改变对老家的身份认同。

都一半(上海和老家),没有哪个地方多一点。因为毕竟我是在老家出生的,我觉得在上海培育了我,养育了我,我又不可能说倾向于哪一边。我记得有一个,“不忘本”,我就觉得自己出生的地方没有什么好隐藏的,好掩盖的。你本来就在那个地方,永远也没办法去改变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一半对一半。

另外一个农民工子女说道:

我记得我同学第一次见到我,说我的第一句话就说,你是上海人伐,就这样子问我的。然后我当时就说是外地的,就直直地回答说是江苏的。然后他们就说我不像外地的,就说我很像上海人啊。因为从小就在这里上学,所以他们就这样(以为我是上海的)……

虽然这些第二代移民的受访者只是初中生,他们也清楚地表达了不能忘本、不能忘记家乡的想法。另有一个受访的学生(无户口)说:

我当然是江苏人啦。我在这边(上海)很久是因为我到这边来借读,来读书,但是我不会忘了我是江苏人嘛。我喜欢上海,但是不能因为喜欢上海就,就感觉乐不思……乐不思蜀,忘记自己的家乡是江苏了吧。

不忘本文化对身份认同有很大影响,无论是第一代移民还是第二代移民,“不忘本”的思想使得他们不愿意在别人面前认同为“上海人”,哪怕被人误认为上海人,也会及时纠正,不然会被认为是“装”或者不认同自己的家乡,而这样是不被社会文化认可的。

与陌生人互动:作为“现代人”的“上海人”

在另外一些情景下,移民也会乐于向别人表明自己是上海人,至少现在居住生活在上海,这在他们面对陌生人,或在离开上海去到外地的时候最明显。一位女性受访者,丈夫是上海人,她这样说道:

我在上海生活了35年,依然说自己是嘉兴人。我真的觉得自己骨子里是浙江的,而不是上海人。但是如果在外边,比如我去香港或者美国,我会接受自己上海人的标签,也会告诉别人我来自上海。

在上海的时候觉得自己不是上海人,因为跟上海人相比,他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受访者经常会说,“上海人会怎样做,而我们不怎样”等等。但是去到外地时,他们发现自己与外地人的差异更大,反而与上海人更加相似,所以反而更加认同自己上海人的身份。很多受访对象(包括有无户口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会说,当我回老家,或者去(上海之外的)别的地方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更像上海人一些,因为我具备了上海人的素质,跟老家的人还是不一样,这些不一样主要体现在日常行为上。

无论是第一代的白领移民,还是第二代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很多人都强调,跟其他地方的人相比,自己“更像上海人”。他们觉得别人会认为他们是上海人,主要是从行为上来判断,言谈举止,衣着打扮,比较懂礼貌等。一个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说道:

我觉得我百分之六十是上海人,百分之四十是安徽人,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是挺懂礼貌的,上海人就很讲礼貌啊,很文明,就不会乱扔垃圾什么的,也很节约。性格比较温和一点(我回安徽老家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我就是像上海人一样,有文化有知识那种。

学生普遍认为,自己跟家乡人相比,在行为上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来自他们在上海的经历,如:

我(来了上海后)现在也觉得变得比较礼貌一点了,说话、谈吐什么的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行为方面的都是比较好的,也比较有内涵,我感觉。

这种个人行为,或者说“素质”上的变化,是他们认同自己“更像上海人”的重要原因,如:

上海人比较大方,很容易跟别人交往,不像我们老家人一样,一般都不主动的,被动型的,希望别人跟你交往。我现在的态度,各方面的表现跟上海的同学更接近一些。比较有文化素养的,就是,就是一个好公民的形象,不会做一些损坏公共规范、不规范的事。

当我们追问为什么他们回到老家会认为自己是上海人时,他们给出的答案很多都与生活细节有

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对自己是不是具备“现代素质”的考量。比如,他们回到家乡,发现自己“更像上海人”,因为与家乡的孩子相比,自己“素质更高。”他们认为自己跟他们的家乡人有很大区别,他们的视野更广,更加文明礼貌,待人处事、跟人交往更加主动有自信等。

这种对现代性和上海所代表的现代文化的认同在白领移民身上也有很明显的体现,比如一位白领本来强调自己不是上海人,因为不能忘本,但是当我们问她,你回去××(她的老家,一个中部的二线城市),会认同自己是××人吗?她回答道:

如果这样说我现在就是上海人,我在××没有任何关系了。所有的都迁到上海了。我一点也不认同××那里的人的做事方式和生活态度。这样说的话我还是更像上海人。

另外一位第一代白领移民也提到对现代文化认同对其身份认同的影响:

我喜欢我婆婆和老公等上海人身上那种现代气息,比如不管闲事,跟别人有边界,很自我等。我去别的地方就会说自己是上海人,因为我觉得上海人挺好的。

不管有无户口,很多访谈对象都提到上海的生活给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带来的影响,比如见识多,公民意识更强,待人处事的方式跟其他地方不同等。这种对现代文化或者“现代性”的认同在很多时候超越户口的限制,使得他们认为自己“更像上海人”。

由此可见,身份认同是在日常互动中,通过观察和感知自己与他人的相同或者不同,比较而得并慢慢得到验证的。人的身份认同可以多重,而且根据个人所处的情景不同随时变化。在不同的人群面前,他们的身份认同也会不一样,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人们利用不同的文化资源储备来为他们不同的身份认同提供依据,如在熟人面前,他们用“籍贯和不忘本”的传统文化来证明自己是家乡人,而在另外的情景下,他们则用“素质”“现代性”等话语,来证明自己是上海人,至少“更像上海人”。

五、文化、日常确证与身份认知

人们对他们周遭世界,包括他们自己的看法往往多种多样,并不是完整或者一致的(Glaeser, 2011),自我身份认同也不例外。对外来移民而言,有关个人身份认知的不同验证过程得到的结果往往大相径庭,使得人们在不同情境下有截然不同的身份认同,然而他们并不因此感到自相矛盾,这是因为人们依赖不同的文化资源来为他们的认同提供依据。

本文采用微观社会学的理论取向(micro-sociological approach),强调文化和社会互动在身份认同中的作用。身份认同首先是一种主观的认识(subjective understanding),是个人对他/她自己的看法。身份认同不是固定的、独立的、外在的范畴,而是个人的认知被不同的验证过程形塑的结果。身份认同既是一种认识,具体在每个人身上,也是一种表达(performance)。不同身份认同的人,在与他人互动过程中的表达会不一样,这样的表达在得到他人的回应后,会反馈回来进一步影响个人的身份认同。

跟所有其他的认识一样,身份认同也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人们用文化中的不同元素来为在不同情境中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提供依据。在没有户口的时候,人们往往认为自己是老家人,并且将户口因素作为这种身份认同最主要的原因。有了当地城市户口之后,在某些情境下,尤其是面对熟人的时候,依然不认为自己是本地城市人,至少不会这样标榜,这种身份认同受到传统籍贯文化的影响,并且在日常人际互动中得到加强。但是当他们面对另外一些互动他者,尤其是在离开上海的时候,却乐于认同自己是上海人,至少更像上海人,这是基于对“上海”所代表的现代文化和现代性,或者“现代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认同。

文化有多个层面,既是宏观的知识体系、规范(norms)和逻辑(cultural logics),也是微观的表达

和实践(performance and practice)。文化是由个人和群体建立、操作,并且提升而成的。文化为人们的身份认同提供资源和依据。文化可以是话语,也可以是规则或者习俗。微观情境(micro-situations)本身就是文化之所在,在微观情境中,文化被创作出来并且成为人们的生活体验(Griswold, 1994)。微观层面作为日常生活实践的文化取向的判断也影响身份认同,这一点在第二代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比如城市里长大的农民工子弟在上海的时候可能觉得自己是外地人,因为他们不会说上海话,跟上海本地学生在某些行为上也有区别,但是回到农村的老家后,发现自己跟当地人也不一样,从而变得更加认同上海的“现代行为和生活方式”,加强了对上海的身份认同。

外来移民对“现代性”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所居城市的认同,从而使得他们即使在户口或者籍贯文化的限制下,也认为自己“更像上海人”。这种在一般叙述中被弱化的身份认同以往没有引起很多关注,但在具体实践中却有可能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行为选择。外来移民的这种拟身份认同如何影响他们的行为选择,如留在上海还是离开,是否参与某些集体行动等,可以作为接下来有关移民和流动人口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蔡禾、曹志刚,2009,《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及其影响因素——来自珠三角的时政分析》,《中山大学学报》第49卷第1期,第148—158页。
- [2]陈映芳,2005,《“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第3期,第119—244页。
- [3]崔岩,2012,《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第5期,第141—160页。
- [4]韩晓燕,2012,《新二元结构破解对策的经验研究——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3期,第134—139页。
- [5]符平,2006,《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实践社会学研究的发现》,《社会》第26卷第2期,第136—158页。
- [6]李培林、田丰,2012,《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社会》第32卷第5期,第1—24页。
- [7]卢晖临、潘毅,2014,《当代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情感与集体行动》,《社会》第4期,第1—24页。
- [8]熊易寒,2009,《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城乡认知与身份意识》,《中国农村观察》第2期,第2—12页。
- [9]许传新,2007,《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学术探索》第3期,第58—62页。
- [10]张结海,2011,《外地白领移民上海文化适应影响因素研究》,《社会科学》第11期,第73—80页。
- [11]张文宏、雷开春,2008,《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第5期,第117—141页。
- [12]郑友富、俞国良,2009,《流动儿童身份认同与人格特征研究》,《教育研究》第5期,第99—102页。
- [13]Gans, H., 1992, Comment: Ethnic Invention and Acculturation: A Bumpy-Line Approach,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11(1), pp. 42-52.
- [14]Glaeser, Andreas, 2011, *Political Epistemics: The Secret Police, the Opposition, and the End of East German Soci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5]Griswold, Wendy, 1994, *Cultures and Societies in a Changing World*, Thousand Oaks, Calif.: Pine Forge Press.
- [16]Jacka, Tamara, 2006, *Women in Urban China: Gender, Migration,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M. E. Sharper, Inc.
- [17]Portes, Alejandro, and Min Zhou, 1993,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30, pp. 74-97.
- [18]Portes, Alejandro, and Rubén G. Rumbaut, 2001, *Legacies: The Story of the Immigrant Second Generatio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责任编辑:匡云)

state is a tool controlled by ruling class founded on the private prope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 Russia and Mongolia and the Progress of Free Trade Area
——Studies Based on SMART Simulations**

Diao Li , Shi Xinxin , Luo Pei

China , Russia and Mongolia are adjacent to each other and each of them has its own economic advantage which will benefit the transnational trade cooperation a lot. On the basis of cross-border economic cooperation among China , Russia and Mongolia ,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trade complementarities among the three countries , and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free trade zon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nd Mongolia using SMART model. This article also casts a simulation on the trade effects , tariff effects and welfare change of various tariff cut schedules among China , Russia and Mongolia by using HS6 digital level data.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rade growth created by phased tariff reduction will be limited. The trade potential of the three countries can be fully tapped only if the free trade area among the three countries is fully completed. At present , on the basis of carrying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 Russia and Mongolia Economic Corridor Planning Framework , industrial docking should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 cross-border economic cooperation should be promoted , and transit to the free trade area will eventually come into reality.

Institution , Culture and Corroboration of Everyday Life——Situa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Migrants and their Children in Urban China

Han Xiaoyan , Tian Xiaoli

This article uses both a macro and micro approach to analyze the self-identification of immigrants in Shanghai (including both migrant workers and white collar immigrants) , which involves the validation of understanding and daily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 respectively. The three processes of validation of one's self-identification; i. e. , recognition afforded by others , corroboration in action , and resonance with past knowledge , often lead to different results. Therefore , the workers and immigrants demonstrate fluidity and flexibility in defining their own identity. Consequently , they selectively assume different and sometimes conflicting self-identitie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 and when interacting with different others. They justify this situational identification with a variety of cultural sources from the existing cultural repertoire , which are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 especially the social importance placed on the ancestral village or place of origin , as well as adherence to heritage and cultural roots. At the micro level , the formation of identity is found to b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dividually lived experiences of everyday life.

Studies on the Demographics of Urban Poverty Population and Anti-Poverty Measures——Based on the Survey into Three Ci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Chen Daiyun , Chen Xi

Urban poverty population is a disadvantaged group which has special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The demographics of this group , on the one hand , reveals its attributes which are the results of poverty; on the other hand , it reflects the inner poverty causes for this group. Therefore , in 2012 , questionnaires about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poverty population were circulated in three cities , Jinan , Qingdao and Liaocheng ,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followed by quantitative studies. On this basis , issues like family plan for anti-poverty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re explored. Furthermore , measures for anti-poverty are proposed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firstly , when starting a family , making rational choice of one's spouse and selecting the right time for marriage; secondly , making a green fertility plan and increasing the cost input on healthy pregnancy and scientific nurture; thirdly , strengthening education investment for higher educational level; fourthly , putting more emphasis on the design of health promotion and disease prevention program; fifthly ,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pporting family pl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ilding a well off society in an overall way.